

2009

向继东 编选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China Cream of Culture & History 2009

- | | |
|-----|-------------------------------|
| 周艾若 | 我的父亲周扬 |
| 房文斋 | 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
| 王 蒙 | 1949 - 1959: 必须快乐的青春 |
| 张贤亮 | 1959 - 1969: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 |
| 周孜仁 | 我在大巴山区搞“四清” |
| 朱 正 |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
| 李冰封 | 洞庭湖畔十年小记 其人其事 |
| 董少东 | “潜伏者”阎又文 |
| 章诒和 | 卧底冯亦代 |
| 林 晰 | 直立行走的水——痛悼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大姐 |
| 苗振亚 | 看章乃器如何做人 |
| 蔡登山 | 储安平婚姻悲剧 |
| 郭英秀 | 张国焘: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强人” |
| 邓宏顺 | 向培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
| 何 蜀 | 吴宓日记中的李源澄之死 |
| 陈 远 | 吴晗: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
| 刘若南 | 李作鹏:人已逝,谜未解 |
| 陈为人 |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经历 |
| 陈 章 | 话说“四人帮”余党马天水 |
| 王万然 | 于会泳的悲剧人 往事沧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2009

向继东 编选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China Cream of Culture & History 2009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 向继东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885-9

I. 2… II. 向… III. 文史资料—中国—2009—汇编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5985 号

责任编辑: 海 帆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3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言

向继东

这是我编选的第五本“文史年选”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尘世里，做一件事，并且一做就是五年，无论对编者、责编和出版社，谁都不容易啊。冷暖甘苦，惟我自知。

本书的编辑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我们无力改写历史，但我们总在尽可能恢复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在自己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就极尽所能地支援“世界革命”。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这些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一些国家的援助要求。如1960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据统计，从1954年起，中国仅向阿尔巴尼亚援助折合人民币就达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这些都写在舒云的《中国援外往事》里，读者自可一阅。也许读后会让你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啊？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其人其事”一辑，收录了章诒和的《卧底冯亦代》和董少东的《潜伏者阎又文》。作者都是写“卧底”，不同的是前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卧底”，在个人道德上可能不是很高尚，你有权争取减轻对自己的处罚，但不能给自己“要好”或朋友设陷阱；后者则是潜伏到敌对力量的内部，搜集情报，以打倒敌手，这在道义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两相对照，阎又文是功臣，而冯亦代是什么？说

得好听一点，尽管不是冯先生个人的责任，但他能说自己干净吗？章乃器那时面对高压，他说了句让人难忘的话：“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冯二人相比，真是云泥之别。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华的《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揭开了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的尘封往事。当年，有20万台湾青年“志愿”加入日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台湾民众当军人，只是作为“军属、军夫”对待。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真的比犬马都不如。战后统计，台籍日军有三万多人战死，可没有抚恤金。经过多年诉讼，直到1988年日本政府才决定给二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籍兵，每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而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

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韩三洲的《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其实就是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读书札记。李新是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2004年去世，该书是2008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李新的原著读。胡平的《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和李非的《台湾土改的启示》，虽没放在同一辑里，但连起来读，确实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述弢的《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其实是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贝利亚。在我们印象里，贝利亚曾是斯大林的红人，1938年至1953年他屠杀了无数苏联人民，制造了许多冤案。读了述弢的文章才知道，其实贝利亚也是要改革的，他有许多新政设想，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写这篇小文时，我在网上搜索，《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得不少网友留言。有位叫“间歇性瞎掰”的网友说，此书编得“通俗但不流俗”。一位来自美国的 almaden reader 的网友在当当网留言说：“第一次买《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看了觉得很好，准备买其它年的。”北京有位叫“知我者书也”的网友，他（她）在2008年4月17日的留言中说：“这套书值得购买。我购买了三本，从2005年到2007年的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编辑向继东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虽然里面……文章尚局限于体制内，但整体来说，以客观求实为准，值得阅读，也值得购买。当然，还有一些好文章没有被收录在内，但我想，这不是向继东的眼光问题。一旦被收录，很可能这本书也出不来了。建议诸位购买，我本人的藏书绝大多数是历史书籍，尤其是近代史，相信我的眼光，也相信向继东。”

说实话，读到这样的留言，当然欣慰。我这里引出，是“王婆卖瓜”，犹如江湖郎中大厅悬挂的“妙手回春”之类；但这也确实让我感到，真正知我者，读者上帝也！

2009年12月13日
于长沙冬夜

目录

CONTENTS

向继东 前言

口述历史

- 周艾若/口述 李 菁/整理 我的父亲周扬 1
- 房文斋 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12
- 王 蒙/口述 朱慧憬/采访整理 1949—1959：必须快乐的青春 17
- 张贤亮/口述 朱慧憬/采访整理 1959—1969：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
更加坚挺 21
- 周孜仁 我在大巴山区搞“四清” 26
- 朱 正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32
- 李冰封 洞庭湖畔十年小记 38

其人其事

- 董少东 “潜伏者”阎又文 41
- 章诒和 卧底冯亦代 53
- 林 晰 直立行走的水 64
——痛悼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大姐
- 苗振亚 看章乃器如何做人 70
- 蔡登山 储安平婚姻悲剧 73
- 郭芙秀 张国焘：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强人” 79
- 邓宏顺 向培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84
- 何 蜀 吴宓日记中的李源澄之死 88
- 陈 远 吴晗：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91
- 刘若南 李作鹏：人已逝，谜未解 94
- 陈为人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经历 98
- 陈 章 话说“四人帮”余党马天水 102

王万然 于会泳的悲剧人生 104

往事沧桑

李恩柱 南宋十五条的处境 107

郭老学徒 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 110

黄波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113

张华 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 117

朱鸿召 想当年，边区善待“外来工” 124

胡平 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 127

邵燕祥 一封1949年的旧信 137

韩三洲 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 143

——读《流逝的岁月》札记

周筱贻 舒芜：大时代的小人物 150

徐庆全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154

王志龙 北平战与和：彭泽湘两封密信影响了毛泽东 162

韩三洲 谁先唱响了《东方红》 164

丁东 法捷耶夫参加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167

舒云 中国外援往事 169

民国人物

胡文辉 不以胜败论陈炯明 177

李杨 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182

杨天石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 193

高华 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203

王彬彬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 207

智效民 “长袍先生”张澜 214

张耀杰	周作人的悖兄与叛国	219
魏得胜	原本的刘文典	222

文史杂俎

林毓生	认识“五四”、认同“五四”	225
	——迟到的纪念	
傅国涌	回眸“五四”90年	228
范泓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236
洪振快	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	238
汪秀枝	在邻居劝说下留学美国的詹天佑	241
刘诚龙	容闳：思想的忠臣	243
曾彦修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246
谢泳	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外二题）	249
欧阳哲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何以成为年谱中的经典	254
李非	台湾土改的启示	259

域外瞭望

雷颐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265
蓝英年	俄罗斯为末代沙皇恢复名誉	268
述弢	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	272
孔田平	通过谈判的革命：波兰的转型之路	277
林达	另一个“圣雄”甘地	283

口述历史

我的父亲周扬

周艾若/口述 李 菁/整理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建国以后，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发起的，当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时，他也获得了“文艺沙皇”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可是政治的惊涛骇浪最终也险些将他吞噬。在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

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楼下摆一桌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大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暂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国起家的，老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分，但更多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1937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的，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做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

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 and 弟弟，带我们三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致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亲戚们都说的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

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父亲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后来成为全国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在哈尔滨工作，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就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

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介入到现实政治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也是从这个时

候起，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很长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不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地带，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出场的机会，就是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后，他慢慢能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

现在回想，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一、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二、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